动态与评论

近年来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进展和新趋势

张永江

清代边疆民族史在中国史研究中是一个牵涉面颇广的交叉型的学术领域，既涉及到清代边疆（包括海疆与陆疆）、边政研究，又包含蒙古学、藏学、满学、维吾尔学、敦煌学、中亚学等专门领域成果，还有南方诸民族研究、跨境民族研究等等，远非笔者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把握。因此，为了方便，本文将相关研究成果区分为中国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东北地区与满族、北方地区与蒙古、西北地区各族、西藏与藏族五个部分加以评论，限于篇幅，重点将放在北方边疆民族地区、各族别史和族际关系史上，时间上则主要限于 2006 - 2007 年间发表的成果，部分研究论著适当向前追溯。缺漏、疏误之处，敬请大家教正。

一、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

中国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研究涵盖了边疆、疆域、族际关系等理论、概念、史实等的研究和探讨，这类研究是跨越朝代，纵贯时空的，但大多引证清代史实，对清代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围绕中国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明显的热点。总体上看，研究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疆域形成理论，一是疆域形成过程。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侧重古代，主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课题涉及古代天下观，治边观，华夷观，大一统观，羁縻政策，宗藩观，宗藩体制，朝贡册封体制，以及国外学界关于中国边疆理论研讨等等。其中用力最勤的是李大龙，从 2004 年发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开始，已连续发表 6 篇。包括《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 1）、《“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 3）和《“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 3）等，这些文章在辨析各种概念（观念）含义的同时，更侧重分析其对各时期疆域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辨析》一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相关的，毕奥南的《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

［收稿日期］2008 - 2 - 10
［作者简介］张永江（1963—），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

概念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2）更强调概念的历史特定性质，“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诚然，概念的辨析，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可防止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古今词义的继承性和历史联系。例如“宗藩关系”一词用指清朝与一部分外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李大龙等人的批评，称“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作者称“没有发现出现很早的‘宗藩’一词有指称邻国或边疆民族的用法”。此说过于绝对，事实上文献中也有将宗藩一词用于属国的情况。如《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壬辰，乾隆帝在得知安南国王阮光平将要来京祝寿的消息后谕令高规格接待时，“又谕福康安于其进关后，应告以此次进京祝嘏，大皇帝于国王到京朝见时特赐金黄鞓带。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今国王特膺异数，比于亲藩，实为难觏宠荣。”[①]六月丙辰，清廷“敕封安南国王阮光平长子阮光缵为世子。制曰、朕惟一人宅中驭外，化覃属国之封。列辟守典承庥，佑启克家之胄。秉义方于夙夜，念笃尊亲。知大德之生成，情徵爱戴。用沛宗藩之懋赏，特昭旷格之殊恩。”[②]而且，笔者以为，宗藩与宗藩关系两词，语源上虽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学者在使用时主要是用“宗藩关系“这一概念指代清朝与属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宗藩指代属国。前者是国际关系之一种，涉及双边；后者则单指一方。东亚历史上国际间的宗藩关系，表述的是宗主国与藩属国（源自本来意义上的宗藩含义，即皇帝与宗室藩王，再扩大到异姓藩王，最后也包括境外属国）关系，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平等不均衡关系（所谓以小事大），是站在王朝中国角度上说的。“藩属关系”当然也可表述双方间这种关系，但却是站在他者即属国角度上说的。大小主从立场不同，两词可以并存，“藩属关系”却不可替代“宗藩关系”的概念。这也是中外学者普遍使用这一概念的本意。

涉及朝贡制度的主要有祁美琴的《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和李云泉的《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两文。前者着眼于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此前，李云泉曾发表《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东方论坛》2003—6)，随后又出版了《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认为“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康熙末年以后，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朝贡贸易日呈繁荣之势。”前文显然是对李云泉观点的一种辩驳。应该说，清代朝贡制度相当复杂，前期与后期不同，在笼统的“朝贡制度”下，涉及的对象与范围、动机与手段都在变化中。清前期也存在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朝贡贸易，而清与周边（如俄罗斯）及西洋国家的关系似也不能全部纳入朝贡体制考量。而且，以单方的“话语”为根据，讨论双边的关系，本身也存在危险性。在后文中，李云泉力图阐明朝贡制度的理论依据，认为“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

作为实证性的研究，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是值得特别指出的。该书共八章，从“宗藩关系的演进”、“宗藩关系的运作”、“礼仪与规范”、“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边界交涉”、“海事与边事问题”、“入华越侨”、“入越华侨”等方方面面研究了1644－1885年间的两国关系，堪称详尽。另外，何新华的《试析清代缅甸的藩属国地位问题》(《历史档案》2006—1）从“语言霸权”的视角，对清代文献和现代研究清代中缅关系的学者“把缅甸看作与朝鲜、越南和琉球一样地位的藩属国”的定论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有清

一代，缅甸并不把中国作为它的天朝上国，也从未自己主动承认过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之相反，缅甸几乎一直以一个平等国家的身份与清朝来往。”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缅甸，这一见解不仅仅是立场转换，更涉及到史料选择和正确分析历史语境及话语权问题。

疆域形成过程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清代，代表作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的系列专著——成崇德主编的《清代疆域形成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了三部。孙喆的《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其独特之处在于从舆图的角度考察清代疆域的形成。作者以康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舆图为例，对这一时期地图绘制的历史及地图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地图与疆域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为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视角。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及其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等的分析，揭示清代驿传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若从疆域研究的视角看，论题颇感分散。宝音朝克图的《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卡伦”一词的词源及涵义，边疆卡伦的分布，卡伦的职能，卡伦的管理等多个角度考察了清代边疆特有的卡伦制度，问题相当集中。不足在于，对卡伦与并存于边疆地区的台站（边台、军台）之间属何种关系关注不够，对晚清的巡边制度也着墨不多。

关注边疆民族社会的特殊性，是近年边疆民族史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动向。张世明自发表《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清史研究》1998—2）以来，持续关注边疆社会的特殊性以及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边疆化现象”。新近发表的《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 —1949）》（张世明、龚胜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提出了“移民社会无序动荡性”、“组织形态变异性”、“王同春模式”等一系列概念，并引用国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加以解释。作者从移民社会入手，聚焦边疆社会的特殊性，颇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边疆地带是文化多样性地带，不仅与内地汉文化不同，各边疆地区彼此间也迥然有异。汉族移民带来的“特殊性”是某一地区特有的，还是边疆共有的？每一特殊现象的存在与表现有无时空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系统研究，都应有大量翔实的资料来证实和支持。受其启发，笔者认为，跨文化的移民自然要造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景观上多样性和交汇性，因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涵化导致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受文化能量的制约，外来移民先“边疆化”、“土著化”，再随着能量的增大，引导、带动边疆土著社会走向内地化（如蒙古牧民定居，改操农业生计，再改操汉语，成为地道农民），移民自身也回归“常态”，可谓中国边疆移民史提供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从长时段来看，移民带来的各种特殊现象，只存在于特定的时期，是“暂时”现象，不断被减少乃至消除才是长期趋势。从法律视角研究边疆民族社会，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成果。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 》（人民出版社，2004）考察了清代治边法制的状况，包括民族观及治边法制思想，边疆与边疆固有的制度文化，边疆法制的近代化与近代民族政治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清朝后期边疆民族立法、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透视。作者将清代全局性的治边思想、治边政策与局部、区域的法律治理结合起来；并注重从南北边疆地区文化类型的角度出发，对清朝在南方和北方的法律调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方法上，注重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中西方制度史上的差异以及现代民族政治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提供的新认识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和边疆法制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有助于加深对二者关系认识的“文化边疆”概念。第二，与张世明的研究视角相近，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由于清代人口激增引发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这一基本事实，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国家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并就这些现象对边疆地区法律制度、

民族关系的影响给予了关注。认为清代边疆人口激增，不仅促使清政府加强了国家对边疆的法律控制，而且还凸现了习惯法在清代边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为边疆法制的近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但是，假如我们把制度及其运行看作是一个系统，那么，仅仅自上而下考察法律系统的建立和配置是不够的，它的运行和实效如何，也应该受到重视。

当然，对边疆社会特殊性的认识是多角度的。祁美琴的《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清史研究》2005—4）考察了边疆地区普遍军事化的现象。张永江的《论清前期内蒙古地区的基本经济类型、特征极其缺陷》（《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则从经济类型的角度考察了清代前期的内蒙古地区。

传统的研究重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领域，文章不少，但鲜有突破。值得提出的是苏德毕力格的《晚清政府对蒙古、新疆和西藏政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主要内容包括：清代前期对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管理及其政策特点；外来侵略与近代边疆危机；新疆变乱与改设行省；开放蒙古与筹划设省；“收回政权”与整顿藏政；清朝治边政策转变的原因与结局分析以及关于一体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

与传统的研究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视角不同，关于清代民族观的研究异军突起。代表性成果是郭成康的《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4）作者视角宏大，思维缜密，通过梳理清代前期几位重要皇帝的“中国”、“中华”观念的认识，认为清朝皇帝“中外一家”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境内各民族对“大中国”、“大中华”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清朝覆亡的历史关头“元明之际‘驱逐胡虏’的故事没有重演，‘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并延续至今，这对已经步入近代世界的中国无疑是一大幸事。”“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结论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对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示。首先，我们应该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以往肯定清朝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在国家一统和缔造版图上。忽视了清朝统治者在整合民族观念，促进大中华民族认同方面的功绩。这无形的历史遗产让我们至今仍在受益。其次，这一新的民族观的研究路径超越了我们以往专注于民族政策的狭窄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清朝成功有效的民族政策从何而来？从而深化我们的研究。

二、东北地区与满族

近年有关清代东北地区的研究成果涉及到满族、新满洲、赫哲族、锡伯族、俄罗斯等多个民族及族际关系。张杰、张丹卉的《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反击沙俄的主力军，东北满族区域文化，学校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等课题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根据史实，驳斥了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清朝初年封禁东北”说。张杰的《满族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虽以专著形式推出，实为多年发表论文的提炼和补充。该书从“三仙女与朱果发祥”的神话传说起，依次论述了满族的源流；建州三卫兴起的关键人物李满住；1644 年满族入关并且取得胜利的原因；满蒙联姻政策在满族兴起和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新满洲”构成东北满族主体之经过；科举考试对满族融入汉文化的影响；“国语骑射”对于满族共同体

形成与八旗武力兴衰的关系；东北满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清代东北区域文化的满族化趋势；作为满族人进身之阶的翻译考试；处处展现满族风情的民俗习惯等十个方面，阐述可谓细致而全面。

族际关系方面，赵英兰《从满化、汉化，到民族多元一体化——清代东北族际关系之演变》(《东北亚研究》2007—5）提出，清代在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多个民族（满、汉、蒙、朝等）三种经济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且互动的格局。这一民族格局并非是静态的，各个民族在保持自身传统的民族地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碰撞、交融，大致经历了满化、汉化，最后形成了东北地区民族多元一体化。周喜峰《论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影响》(《求是学刊》，2006—3）一文，从外部因素进行审视，以当时与满洲关系最密近、影响最大的科尔沁蒙古为切入点，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阐述其对满族形成的作用。

关于清韩关系，孙卫国的《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2）讨论了明末以来建州女真-清朝与朝鲜双边关系的演变，不同以往的是其视角放在了朝鲜的“文化心态”上。

关于锡伯族，杜家骥《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求是学刊》，2006—3）提出，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这一追溯，对我们理解锡伯人如何获得了满族性质甚有益处。

关于新满洲也有新成果发表。陈鹏的《清代前期东北地区赫哲“新满洲”形成初探》(《史学集刊》2007—6）讨论了赫哲人旗“新满洲”后，即调往东北各地驻防，与旧满洲共处而全面满化，最终融入满族共同体，完成了由赫哲而新满洲，由新满洲而满洲的历史进程。

围绕八旗，论文依然不少。刘小萌的研究最为活跃。2006—07年连续发表了《清代北京的碓房与八旗生计》(《清史论丛》，2006年号)、《关于清代北京旗人谱书：概况与研究》(《文献》2006—2)、《内务府世家的类型及其婚姻关系》(《清史论集》，人民出版社，2006)、《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寻踪》(《清史论丛》，2007年号)。以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研究的重心是清代的旗人社会。作者关于俄罗斯佐领的研究引人关注，不仅因为该论题前人少有涉及，更在于方法上尝试将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并利用了碑刻拓片等新鲜史料。据闻，作者磨砺多年的专著《清代旗人社会研究》已经交付出版，即将面世。不但京旗社会，驻防旗人社会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潘洪钢的《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认为“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笔者对这一结论持保留意见，文化交汇当然有双向影响的情况，但并不是对等的。所谓旗人对当地习俗的影响不过是旗人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些孑遗，很难说有多深。至于说旗人长期保有自己的族群意识，是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原因更加复杂，恐怕不单单是习俗弃留所能解释的。作者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从事田野调查，收获了文献上所没有的东西，值得赞赏。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5）认为，“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

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但细审全文,作者的论据似不够坚实。如推测驻防志中的记载"某佳氏"均为汉族,并不可靠。清代有汉军和汉人两个概念。汉军作为旗人,其权利义务与满洲、蒙古八旗人士略同,八旗内部各集团之间可以自由通婚。汉人与旗人通婚即便有,也是个别情况,且系单向娶进,不能视为通常情形。

三、北方地区与蒙古

近年涉及清代北方地区与蒙古史的研究相当分散，包括贸易、榷关、王公年班制度、西人传教、卡伦边防、蒙地开垦、财政、经济开发、寺院经济、蒙汉文化交流、各部落史研究等，林林总总，不下数十篇。从研究动向上来说，清代内蒙古地区经济和明清以来各部落变迁史成为新的热点，这有别于过去侧重政治视角的满蒙关系、政治制度等研究。

蒙古地区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受全国性的社会史、经济史热的推动，状况大有改观。

城镇研究有了专门性的著作。乌云格日勒的《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综合利用了蒙汉文档案、地方文献，特别是日本人的调查报告，对清代内蒙古城镇兴起的社会背景，地方设治与内蒙古城镇的关系，清－近代城镇的分布与特殊类型，城镇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功能以及城镇社会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贸易方面，过去主要研究旅蒙商，现在长城边口贸易也有专题论文出现。祁美琴的《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清史研究》2006—3）在与明代长城边口互市对比的基础上，对清代长城边口贸易存在的原因、贸易的特点、管理及其性质诸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明代的一些新特点。关于蒙古沿边地区的榷关，过去只是在探讨旅蒙商和"走西口"才涉及到，廖声丰的《清代前期北方边疆地区的榷关》（《贵州社会科学》2007—10）对清代前期北疆地区的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多伦诺尔、古北口等地征税的榷关进行了总体研究，认为北疆地区榷关对于促进北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内地与北疆地区成为一个牢固的经济共同体，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台湾吴美凤的《清代的杀虎口税关》（《山西大学学报》2007—2）则通过考察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88件清代杀虎口税关奏折的内容，廓清了清代"远在边疆"的杀虎口税关的财政、国家行政职能、土地和税关修缮等问题，试图说明杀虎口在清代中国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与此相关，还应提到王泽民的《杀虎口与北方边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该书虽不限于清代，但也主要是从税关角度论证杀虎口。

明清时期蒙古各部落史的研究是近年蒙古史及清代边疆民族史领域的最大收获。直接导因是清代满蒙文历史档案的大规模发掘和利用，如李保文刊布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内蒙古少儿出版社，1997）、齐木德道尔吉等刊布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清内阁蒙古堂档案》（22卷）等等，当然，研究理念特别是史料及分类观念的更新也很关键。比较重要的成果反映在宝音德力根等主编的《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一、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2002）和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第七－九辑）及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中。其中达力扎布重点探讨清初蒙古扎萨克旗的起源、察哈尔部设旗等问题，宝音德力根侧重研究明代蒙古各部落历史变迁，乌云毕力格则把重点放在明末清初各部落历史研究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原始的满蒙文档案，参以其他文献，与过去主要依靠官书文献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以下以乌云毕力格近年的研究为例试作评论。

1999年以来，乌云毕力格陆续用蒙、汉、德、日等文字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包括《从17世纪前半叶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1－5系列论文，涉及到东、西土默特部、察哈尔部、林丹汗、喀尔喀各部、朵颜兀良哈部、和硕特部、车臣汗部的政治、外交、牧地、军事行动等多方面问

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众所周知，万户制度是元明时代蒙古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也是明清蒙古部落和盟旗的基础和母体。要解明明清时期蒙古部落的来历，必须先搞清楚各万户的来历及其崩解后的去向。但这必须打破以往的学科领域分隔，将元明清三时期北方历史贯通，纵向加以考察才能实现。因此这项研究前无古人。本书共九章，25 万字。主要内容是探讨喀喇沁万户形成、发展史及喀喇沁——满洲关系史。包括喀喇沁名号的起源、喀喇沁万户的形成与阿速特、永谢部、山阳万户的解体与东土默特部的起源，喀喇沁万户中“诺颜－塔布囊”体系的形成，喀喇沁万户与爱新国的复杂关系，喀喇沁、土默特与爱新国的对外关系，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结局诸问题。阐述了从十三世纪初钦察人——元朝皇帝护卫军——应绍卜万户——喀喇沁万户——喀喇沁部、东土默特部和满洲八旗内之蒙古佐领为止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嬗变史。这项成果可谓系统、深入，不仅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对理解 17 世纪前半期蒙古社会、政治的变迁及满洲在漠南蒙古统治的逐步实现，都有很大的帮助。

概括起来，这项成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作者具有自己明确清晰的史料观念。作者接受德国伯伦汉的史料学理论，将史料根据性质，分为两种：一为“遗留性史料”，一为“记述性史料”。前者是客观的，无意识的，因而是可靠的；后者则是主观的有意识的产物，必须审慎地进行真伪鉴别和正误评判。正确确定本项研究在史料上的立足点，可以保证作者研究过程中正确地使用史料。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利用了“历史的批判的研究方法”，将传统史料考证和现代西方的文书研究、文本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历史事实进行认真考订和充分论述。针对不同的史料，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手段。三，在史料方面，以蒙古文文书档案、满文档册和明朝兵部题行档等“三种文字档案”等“遗留性史料”为主要资料，并以明清时期的蒙、满、汉等文献记载为辅，相互印证，进行严谨的史料分析。四，在史实、观点方面，发现了构成喀喇沁万户的各成员集团，详尽论述了该万户形成、发展和解体的全部过程，以及它与后金王朝的关系。其中，对喀喇沁万户的各个成员及其融人万户的过程、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游牧地、林丹汗西迁时期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动向、该万户与满洲关系，以及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最后结局等问题的阐明，允称新的贡献。五，严格遵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规范，在史料描述、专名翻译转写、文献征引注释等方面都很严谨。特别是书后所附“人名索引”，非常便利。

需要说明的是，该书以“爱新国”取代以往中国学界熟悉的“后金”一名，虽有一定道理，但毕竟不合中国习惯。日本学界采用这一译名情有可原，从中文的角度看，“爱新国”（音译）和“金国”（意译，为免与金朝相混，改成“后金”）都是满文 Aisin gurun 的翻译，而“后金”系努尔哈赤自己使用过的名号[3]，更符合“名从主人”原则，改译改称反觉不便。

类似的研究还有特木勒对朵颜卫的研究，《朵颜卫研究——以十六世纪为中心》（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张永江关于喀喇车里克部的研究，见《从一份顺治五年蒙古文档案看明末清初翁牛特、喀喇车里克部的若干问题》（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I，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ongolian Culture，Tokyo，2005）。齐木德道尔吉对乌喇忒部的研究（《乌喇忒部迁徙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3）等等。

近年来利用遗留性史料即满蒙文档案研究清代、近代蒙古史已经蔚成风气，并由部落史、政治史向其他领域拓展。如胡日查的蒙古寺院经济研究（《清代蒙古寺院经济研究》，《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珠飒的《喀喇沁衙门档案与移民史研究——以早期汉族移民管理与移民稽查制度为中心》（《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乌仁其其格的《清代大青山各沟煤矿业概述——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矿务档案为例》，都显示了研究的力度。

四、西北地区各族

有关西北地区的成果，除了关涉全域的综论性的论著外，主要集中在卫拉特各蒙古部和

回疆地区两方面。

牛海桢的《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立足于民族关系,以民族政策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清朝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政策。全书共十章,前三章纵向讨论清代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源起及其确立,鸦片战争前后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转型。第四到第八章分别从政治、经济、边防、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民族政策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九章划分了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类型,第十章对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做了定性评价。有论者评价其创见"是对民族政策学的探讨,有一定的前瞻性。"清朝的民族政策被誉为成功,内容丰富,值得总结,但有无必要上升到"学"的高度,值得斟酌。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依然热度不减。相关论文不下十篇,比较重要的成果是两部著作。侯德仁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分为兴起、发展、繁荣、终结四个阶段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特点。新意在于"改变了历来学术界研究清代边疆史地学偏向于私家名著的倾向,"但总体显得平铺直叙。与此不同,郭丽萍的《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专注于嘉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更加细致深入。作者对清中叶西北史地研究的定位是"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经世致用的贯彻、考据学的发扬。"此系本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贡献。

卫拉特蒙古史方面,黑龙围绕噶尔丹与准噶尔连续发表了《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与清朝的贸易往来》、《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卫拉特研究》2006—2、4),就一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崔岩的《噶尔丹死亡考辨》(《清史研究》2007—1)主张"自杀说",排除了"病死说"。梁丽霞、王希隆发表了《清前期的西北战局与阿拉善蒙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将阿拉善蒙古放到这一动荡局势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其与西北其他势力集团的复杂关系,探讨了其与清政府之间相互选择的过程,并论述了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稳定西北局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回疆(新疆)的研究,清前期集中在法律、制度方面;近代以后集中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王东平近年持续地致力于回疆法律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专著《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分七章深入探讨了清代回疆地区法律典章,清代回疆行政法规,清代回疆刑法,清代回疆司法制度,清代回疆伊斯兰民事法,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诸问题。此外还有论文《〈大清律例〉回族法律条文研究》(《回族学与21世纪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政治制度方面,王东平《清代回疆伯克制度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5—1)认为"清朝统一回疆之前该地最具地方特色的行政制度——伯克制度,存在着一套固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规范,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改造伯克制度并将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序列的基础。"作者经过爬梳史料,确有新的发现,即清代回疆地区的伯克职官名称和实际职掌并非完全相合,名不符实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甚至可以被视为清代伯克制度的一个特点。其最新成果《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通过对流失海外珍贵档案的解读,完善丰富了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的研究。此外,作者还发表了《"塔里雅沁"考》(《新疆大学学报》2007—4)将该词的出现由清代文献上溯到蒙元时代的蒙古语和汉文文献以及成书于哈喇汗王朝时代的《突厥语大词典》。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6—2)认为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一是体现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二是北疆商业市场机制的形成对北部城市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意义重大,改变了历史时期"南重北轻"的新疆城市分布格局。

五、西藏地区与藏族

清代藏史的研究,关心点依然集中在清朝

在西藏的政策与施政过程、达赖、班禅系统与喇嘛教等老问题上，重复研究不少。值得提出的有周融冰、封加斌的《论嘉庆帝治理西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2），不再把视点集中在康雍乾诸帝的治藏方略上，而是下移到嘉庆时期，认为嘉庆帝执政期间，在西藏整肃吏治，坚决贯彻各项成章，殚精竭虑，为进一步巩固自清政权入关以来的治藏成果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昧于世界大势，加上国力的限制，嘉庆帝在西藏边境上采取了“置之不问”的闭关主义对外政策和“慎重”的单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导致西藏藩篱不保，给中国的西南边防留下了隐患。李保文的《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西藏研究》2006—1）通过对比满、蒙、汉文历史档案文献，认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十日）条所记当为“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五日”蒙文文书的误解，添加的“达赖喇嘛”字样，是清朝修史者异想天开杜撰的结果。五世达赖喇嘛应邀觐见，说明藏区政教界对新兴的大清政权的高度重视。清朝频繁遣使藏区及达赖喇嘛等屡屡遣使清朝，表明双方都渴望建立一种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达赖喇嘛要求变更会晤地点以及提前辞行，并非出于“达赖喇嘛长时观望不决”，而是出于他个人及其随从等健康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一项“转换立场”的研究，笔者大半同意作者的看法，但说清朝史官杜撰，似乎过分。修史者的问题在于将日期误载，于事实并无添加。最后一点，笔者仍然认为五世达赖的决定是出于政治考量的结果（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相关部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平措塔杰《再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概念和1642—1705年政教合一制度的有关问题》（《西藏大学学报》2006—2）认为，目前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概念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造成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时间存在分歧。作者通过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概念的进一步探讨，认为“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产生于萨迦政权时期”的说法更为科学。文章还对1642－1705年西藏地方历史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制度。在这一问题上要统一认识，仍需时日。陈庆英《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3、4）运用藏汉文材料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近年颇受关注。扎洛先后发表了《〈五世达赖喇嘛1680年发给门隅、洛渝地方之法旨〉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4）、《清宫档案中有关颇罗鼐平息不丹内乱之史料》（《西藏研究》2004—4）讨论相关问题。周娟、高永久《试论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再次提起这一问题，试图弄清它与周边地方政权不丹之间早期交往的历史，追溯两地宗藩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还分析了随着清朝中央政府的衰落和英国政府加强对南亚渗透，两地宗藩关系逐渐弱化以致瓦解的过程。

总体看来，近年清代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少，新领域的开拓，新理论方法的尝试都令人欣喜。但老问题依然存在，许多研究选题重复，观点缺乏新意。这既有问题意识缺乏的原因，也往往因论者视野太窄，对先行研究不重视，造成无意中的重复劳动。显然，真正突破性的成果，不见得都是鸿篇巨制，但明确的问题意识，透彻的先行研究，恰当的解释工具，扎实的史料功夫，严谨的学术态度，缺一不可。笔者在此与同仁共勉。

---

①《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壬辰条。

②《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丙辰条。

③黄健彰：《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6年。另见孟森《满洲开国史》，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